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文化产业集聚动力分析

——基于藏羌彝走廊数据的实证研究

方永恒¹,赵雪莹¹,马亚冰²,宋婉怡^{3*}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3. 西北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基于集聚经济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选择效应理论等构建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动力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探析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由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产业匹配、选择效应四大动力因子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发挥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研发支出、金融产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禀赋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对文化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正向的影响,并且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时,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幅度具有差异性。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和市场规模,这两种动力因子未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企业异质性;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1-0070-08

一、引言

藏羌彝走廊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民族迁徙廊道,是包含藏族、羌族、彝族及其他民族的多民族聚集群体地区。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一系列规划促进区域文化产业集聚发展。但是,文化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因地域差异和时代进步发生改变,特别是作为藏羌彝走廊地区而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与其他的城市相比存在差异,因此应深入了解其内在规律,对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产业集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产业空间集聚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有关产业集聚的研究不断涌出。动力机制作为文化产业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早期国外学者涉及较多的是定性描述,后续研究才逐步研究原因、作用关系等^[1]。产业集聚最开始的形成原因多是地理性因素^[2],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经济速度增长加快,政策因素也成为影响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因素^[3]。除此之外,创新人才、环境包容度^[4]也是文化产业集聚的关键要素,并提出“创新人才”是最为

重要的要素^{[5]59-90}。近年来,有关文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不断丰富。学者们从经济学、地理学等方面,分析不同地区文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6]。研究发现政策、财政支出、需求、人力资本与资源禀赋、通信设施等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显著作用^[7]。目前,学者们通过构建不同的动力模型,用以表明文化产业集聚机制过程,进一步分析科研、教育经费、邮电业^[8],以及文化从业者数量、市场规模等对文化产业集聚产生的正向显著作用。文化产业集聚是驱动因子和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要素的相辅相成,从而促进集聚效应呈现^[9]。

“新”新经济地理学借鉴“新”新贸易理论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研究存在差异的微观主体在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集聚问题上做出的反应^[10]。基于此,不少学者将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的研究聚焦到微观主体,但是忽略了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引入的企业异质性使得问题研究更符合现实,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才具有推动作用。朱云平^[11]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出发研究产业链优化,并对核心企业和非核心企业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刘

收稿日期:2023-10-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及政策研究”(71974155)

作者简介:方永恒(1968-),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集聚;赵雪莹(2000-),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文化产业集聚。E-mail:1147435782@qq.com

* 通讯作者:宋婉怡

会学等^[12]对核心企业异质性要素特征进行研究,并从特征要素形成以及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和探讨。梁琦等^[13]指出由于企业生产率不同,区域政策制定会影响企业选址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其异质性最终体现在生产率不同,从而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14]。总体来说,由于企业异质性的存在,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从产业链、资源禀赋等多方综合考虑,从而获得相对优势。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集聚的研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不少研究中,企业异质性假设被考虑在文章中,这是非常迫切以及有必要的。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出发,探究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为制定藏羌彝走廊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和要素支持提供科学合理依据,更加有效地促进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发展。

二、理论分析

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其关键核心在于文化创意,通过借助新兴技术,文化创意人才对特色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以及信息产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的支持,从而进行文化产业和服务的生产和销售。文化产业集聚过程中涉及多种要素的影响,其中涉及到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产业匹配、选择效应等多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而不仅仅是某一种影响因素的单独作用,在全面考虑到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产业匹配、选择效应四大动力机制的基础上,还需要考虑到企业异质性现实情况,并基于此,构建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动力理论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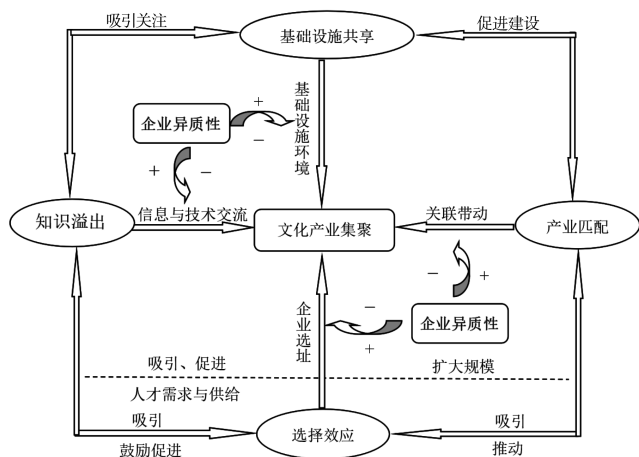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

1. 基础设施为文化产业集聚提供发展基础

通过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文化企业及相关企业入驻,共享某一区域所提供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从而发挥知识溢出效应,而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吸引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其他产业通过落地某一区域,从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2. 知识溢出为文化产业集聚提供动力

知识溢出包括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两种动力因子,文化产业作为附加值高、创新性强的产业,两大动力因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当某一区域人力资本发生聚集,从而使当事人获取新的创作灵感,而研发支出促进科研技术或创新成果的产出,聚集区内的相关企业,共享科技创新成果,因此,知识溢出为文化产业集聚提供人才需求与供给,以及进行信息与技术交流。

3. 产业匹配关联带动文化产业集聚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而言,它并不是独立的个体,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关联产业的支撑,其中信息产业、教育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为文化产业提供高新技术、创意人才、资金支持等,从而吸引更多的文化企业入驻,以产业匹配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集聚。

4. 选择效应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发展

某一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除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产业匹配之外,还会考虑选择效应,其中包括企业生产率、区位选择、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这些因子会影响文化企业选址,从而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发展,而当某一区域具备全部或具备某种动力因子,将会吸引人力资本聚集,而选择效应也会作用于产业匹配,即动力因子之间会形成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藏羌彝走廊涵盖七省(区)37市(州、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基于藏羌彝走廊区域划分界限的标准,本文选取2015—2019年藏羌彝走廊15个重点市(州),包括甘孜、绵阳、乐山、雅安、成都、昆明、甘南、张掖、兰州、拉萨、毕节、六盘水、贵阳、西宁、西安作为研究区域^[15]。本文研究数据主

要来源于2016—2020年《甘孜统计年鉴》《毕节统计年鉴》《成都统计年鉴》等15个重点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官方网站原始数据、各城市统计公报和各城市文化产业发报告等相关资料。

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文化产业集聚,用区位熵(LQ)表示。本文用各市(州)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与各省之比表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

(2) 调节变量

企业异质性,用劳动生产率(M)表示。考虑到文化产业数据可获取性,本文采用各市(州)文化产业增加值来衡量产出,采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单位就业人数来衡量劳动投入,用产出和投入之比表示劳动生产率^[16]。

(3) 解释变量

基础设施共享,用人均邮电业务量的对数(X_1)表示。文化产业作为高附加值、创新型产业,通讯设施的发达程度将直接影响文化产业的效率 and 创新能力,因而选取人均业务量代表基础设施发达程度^[17]。

知识溢出,用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数的对数(X_2)

代表人力资本,用科学技术支出(X_3)代表研发支出。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取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数代表人力资本,而研发支出越多的地区,该地区创新能力就越强,从而影响文化产业集聚,所以用科学技术支出代表一个地区的研发支出情况。

产业匹配,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代表(X_4)金融业发展水平,用每万人互联网人数的对数(X_5)代表信息产业发展水平^[7]。一个地区文化企业是否能够得到资本、政策支持,取决于该地区文化金融市场是否发达,所以选取这一指标代替金融业发展水平。作为文化产业,信息获取渠道丰富、科技应用最新,对文化产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选取每万人互联网人数的对数代表信息产业发展水平。

选择效应,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单位就业人员的对数(X_6)代表人力资源禀赋,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X_7)代表市场规模。基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文化企业的选择更注重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两方面,因此,本文选取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单位就业人员代替人力资源禀赋。一般情况下,家庭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反应该地区民众消费能力和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因而这一指标能够代表该地区文化消费需求的规模。各指标的选取及测度见表1。

表1 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动力因子指标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的定义及测度方法
被解释变量	文化产业集聚	文化产业集聚度	文化产业区位熵
调节变量	企业异质性	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基础设施共享	基础设施发达程度	人均邮电业务量的对数(元/人)
解释变量	知识溢出	人力资本	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数的对数(人)
		研发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亿元)
	产业匹配	金融产业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
		信息产业	每万人互联网人数的对数
	选择效应	人力资源禀赋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单位就业人员的对数(万人)
		市场规模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3. 模型设定

鉴于前文分析,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主要考虑文化产业集聚可能由于企业异质性存在而受不同动力因素的影响,因此,综合考虑前文相关文化产业集聚理论分析与本文研究目的,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具体模型如下:

$$LQ = \alpha_0 + \alpha_1 X_1 + \alpha_2 X_2 + \cdots + \alpha_7 X_7 + \mu_i \quad (1)$$

$$LQ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M + \beta_3 X_2 + \cdots + \beta_8 X_7 + \mu_i \quad (2)$$

$$LQ = \varphi_0 + \varphi_1 X_1 + \varphi_2 M + \varphi_3 X_1 \times M + \varphi_4 X_2 \cdots + \varphi_9 X_7 + \mu_i \quad (3)$$

式中: LQ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文化产业集聚;

$\alpha_0, \beta_0, \varphi_0$ 为常数项; μ_i 为随机扰动项; M 为调节变量, 表示生产率; 其余变量为解释变量, X_1 为基础设施发达程度; $X_1 \times M$ 为基础设施发达程度与生产率的交互项, 其余为解释变量与生产率的交互项。

四、实证分析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综合来看, 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度所选城市样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文化企业进行选址更偏向于发展环境更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城市, 从而发生文化产业集聚。文化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 至少超过一半的文化企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平均水平以上。从解释变量来看, 所选样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有超过半数

的城市文化娱乐占消费支出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以上, 其余都低于平均水平以下。

表 2 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LQ	0.360	4.794	1.496	1.328	0.885
M	1.874	6.895	4.716	4.973	1.345
X_1	7.181	10.192	8.193	7.945	0.786
X_2	7.667	12.392	9.820	9.461	1.638
X_3	0.360	48.650	10.108	3.310	12.741
X_4	0.605	5.796	2.110	1.520	1.406
X_5	1.577	7.134	4.656	4.537	1.329
X_6	6.328	11.429	8.504	8.415	1.396
X_7	0.046	0.163	0.103	0.105	0.028

(2) 相关性分析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LQ	M	X_1	X_2	X_3	X_4	X_5	X_6	X_7
LQ	1								
M	0.596***	1							
X_1	0.156	-0.256**	1						
X_2	0.535***	0.160	0.249**	1					
X_3	0.545***	0.270**	0.256**	0.749***	1				
X_4	-0.020	-0.416***	0.480***	0.446***	0.085	1			
X_5	0.443***	0.378***	-0.016	0.779***	0.715***	0.189	1		
X_6	0.403***	-0.151	0.372***	0.850***	0.726***	0.483***	0.694***	1	
X_7	0.329***	0.228**	-0.226	0.607***	0.485***	0.059	0.614***	0.469***	1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结果显示, 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对结果进行分析, 文化产业集聚度 (LQ) 和企业劳动生产率 (M)、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的对数 (X_2)、科学技术支出 (X_3)、每万人互联网上网人数的对数 (X_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单位就业人员的对数 (X_6)、文化娱乐占消费支出比重 (X_7) 表现为显著正向相关性, 并且以上均通过 1% 的显著性检测。初步说明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数、科学技术支出、每万人互联网上网人数、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单位就业人员和文化娱乐占消费支出比重, 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积极作用。

2. 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第(1)列为四大动力机制与文化产业集聚相互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人力资本 (X_2) 和金融产业 (X_4) 分别在 1% 和 5% 水平下显著, 其余变量未发生显著性效应。人力资本估计系数为

0.370, 可以得出人力资本对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有正向影响。在以往研究中, 人力资本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 其原因在于文化产业作为高附加值、创意性强的新兴产业, 高素质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在进行工作沟通交流过程中会不断激发从业人员的创新能力, 从而发生知识溢出效应, 本文实证结果同样证实了以往研究的结论。金融产业估计系数为 -0.203, 可以得出金融产业对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有负向影响。作为金融业而言, 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但从实证结果来看, 藏羌彝走廊的金融业发展对文化产业集聚产生负向影响, 其原因可能在于, 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小微企业居多, 而金融业对文化产业支持多考虑文化企业自身实力, 对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不足以支持企业发展, 导致金融业发展并没有转化为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动力。

如表 4 所示, 第(2)列加入生产率 (M), 结果显

示生产率的列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产率显著影响了文化产业集聚。在上文的文献分析与理论分析中,文化产业集聚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不仅受制

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与文化产业微观企业相关,两者之间也许存在相互影响从而影响文化产业集聚。

表4 企业异质性调节下动力机制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回归结果

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常数	-2.158 (-1.440)	-2.045 (-1.910)	-2.056 (-1.916)	-3.875 *** (-3.186)	-3.655 *** (-3.582)	-1.904 (-1.636)	-4.871 *** (-4.488)	2.539 (1.887)	-2.056 (-1.916)
X_1	0.180 (1.183)	0.065 (0.593)	0.064 (0.583)	0.074 (0.778)	0.082 (0.890)	0.026 (0.241)	0.087 (0.850)	-0.007 (-0.065)	0.037 (0.325)
X_2	0.370 *** (2.825)	0.045 (0.441)	0.088 (0.820)	-0.067 (-0.732)	0.041 (0.478)	0.035 (0.358)	0.012 (0.131)	0.099 (1.020)	0.040 (0.396)
X_3	0.012 (0.961)	0.002 (0.174)	-0.000 (-0.014)	-0.017 (-1.888)	-0.030 *** (-3.052)	-0.007 (-0.700)	-0.010 (-1.029)	-0.010 (-1.068)	-0.002 (-0.173)
X_4	-0.203 ** (-2.271)	0.007 (0.108)	0.034 (0.475)	0.065 (1.067)	-0.022 (-0.375)	0.121 (1.448)	0.040 (0.620)	0.027 (0.416)	-0.007 (-0.097)
X_5	0.007 (0.062)	-0.379 *** (-3.903)	-0.376 *** (-3.889)	-0.365 *** (-4.309)	-0.286 *** (-3.444)	-0.470 *** (-4.593)	-0.373 *** (-4.125)	-0.429 *** (-4.635)	-0.381 *** (-3.913)
X_6	-0.138 (-1.072)	0.506 *** (4.136)	0.468 *** (3.733)	0.729 *** (6.245)	0.636 *** (6.051)	0.624 *** (4.819)	0.614 ** (5.184)	0.555 *** (4.787)	0.546 *** (4.176)
X_7	-0.597 (-0.138)	1.437 (0.463)	-1.174 (-0.317)	2.255 (0.833)	-1.244 (-0.471)	-0.947 (-0.297)	2.068 (0.714)	1.297 (0.445)	2.106 (0.658)
M		0.608 *** (8.015)	0.648 *** (7.919)	0.837 *** (10.173)	0.891 *** (10.801)	0.782 *** (7.354)	0.809 *** (8.695)	0.718 *** (9.035)	0.620 *** (8.028)
$X_1 \times M$			0.117 (1.275)						
$X_2 \times M$				0.178 *** (4.667)					
$X_3 \times M$					0.038 *** (5.373)				
$X_4 \times M$						0.140 *** (2.271)			
$X_5 \times M$							0.170 *** (3.322)		
$X_6 \times M$								0.143 *** (3.122)	
$X_7 \times M$									2.109 (0.877)
R^2	0.406	0.701	0.709	0.777	0.794	0.724	0.745	0.741	0.705
调整 R^2	0.343	0.665	0.668	0.746	0.765	0.685	0.709	0.704	0.663
F	6.449 ***	19.081 ***	17.305 ***	24.803 ***	27.440 ***	18.619 ***	20.807 ***	20.327 ***	16.986 ***

注:括号里面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第(3) - (9)列分别为加入各变量与生产率的交互项。其中,第(3)列加入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和生产率的交互项。第(9)列加入市场规模和生产率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生产率没有起到调节作用;第(4)(5)(7)(8)列分别加入人力资本、研发支出、信息产业、人力资源禀赋和生产率的交互项,都在 1% 水平下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 0.178、0.038、0.170、0.143,表明生产率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第(6)列加入金融产业和生产率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在 5% 水平下显著,估计系数为 0.140,说明生产率对于文

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3. 进一步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对文化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探究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情况,调节变量划分为平均值水平,高水平(平均值加 1 个标准差)、低水平(平均值减 1 个标准差)。

由表 5 和图 2 可知,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时,影响幅度存在差别。劳动生产率处于平均值和高水平时,人力资本对于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而生产率处于低水平时,人力资本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呈现显著

负向影响作用;企业生产率处于平均值和低水平时,研发支出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位熵呈现显著负向影响作用,处于高水平时,研发支出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位熵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作用;生产率处于平均值和低水平时,金融产业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位熵的影响不显著,而高水平时,金融产业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位熵呈现

显著正向影响作用;生产率处于平均值和低水平时,信息产业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位熵呈现显著负向影响作用,处于高水平时,信息产业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位熵的影响不显著;企业生产率处于平均值、高水平和低水平时,人力资源禀赋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位熵都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但影响程度有差异。

表 5 简单斜率分析

变量	调节变量水平	回归系数	标准误	<i>t</i>	<i>P</i>	95% CI	
人力资本 (<i>X</i> ₂)	平均值	-0.067	0.092	-0.732	0.467	-0.247	0.113
	高水平(1SD)	0.174	0.093	1.875	0.065	-0.008	0.356
	低水平(-1SD)	-0.309	0.117	-2.647	0.010	-0.537	-0.08
研发支出 (<i>X</i> ₃)	平均值	-0.030	0.010	-3.052	0.003	-0.049	-0.011
	高水平(1SD)	0.022	0.009	2.486	0.016	0.005	0.039
	低水平(-1SD)	-0.081	0.017	-4.696	0.000	-0.115	-0.047
金融产业 (<i>X</i> ₄)	平均值	0.121	0.083	1.448	0.153	-0.043	0.284
	高水平(1SD)	0.311	0.149	2.081	0.041	0.018	0.604
	低水平(-1SD)	-0.069	0.075	-0.926	0.358	-0.216	0.077
信息产业 (<i>X</i> ₅)	平均值	-0.373	0.090	-4.125	0.000	-0.551	-0.196
	高水平(1SD)	-0.143	0.115	-1.244	0.218	-0.369	0.082
	低水平(-1SD)	-0.604	0.113	-5.348	0.000	-0.825	-0.382
人力资源禀赋 (<i>X</i> ₆)	平均值	0.555	0.116	4.787	0.000	0.328	0.782
	高水平(1SD)	0.749	0.139	5.398	0.000	0.477	1.021
	低水平(-1SD)	0.361	0.124	2.911	0.005	0.118	0.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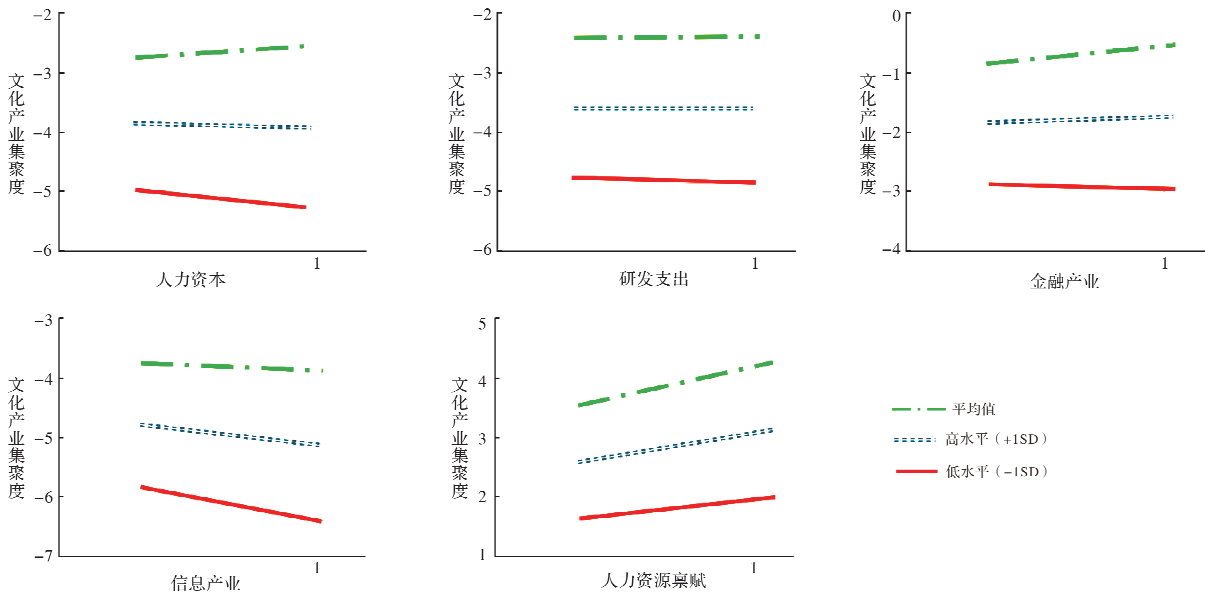


图 2 简单斜率图

4.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

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代表基础设施共享的指标替换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以检验动力机

制与文化产业集聚之间的作用关系,并考察企业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在替换解释变量之后,企业异质性仍在不同水平下调节解释

变量,影响文化产业集聚。结论与前文一致,验证了结果具有可靠性。

(2) 样本缩尾处理

为剔除异常值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采用1%分位处以及99%分位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值分别替代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值。结果显示企业异质性对动力机制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结论与前文结论一致,证明文实证结果具可靠性。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依据藏羌彝走廊15个重点城市2015—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其动力机制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程度存在差异,在未考虑企业异质性时,人力资本和金融产业两变量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其他因子未产生显著影响。(2)当加入企业异质性调节变量时,对文化产业集聚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且在不同调节水平时,知识溢出中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与文化产业相匹配的金融业、信息产业以及选择效应中的人力资本禀赋对文化产业集聚发挥不同程度影响。(3)企业异质性处于高水平时,各动力因子对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处于中、低水平则发挥不同方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分析,提出以下参考性建议:(1)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完善金融市场环境,实现金融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吸引文化企业集聚,使得区域内的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发展。(2)地方政府应提高科技支出比重,将科技支出作为财政的必要支出,并根据当地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合理安排科技研发费用支持领域,制定差别化科技支出政策,加速形成文化产业创新新格局。(3)结合区域发展实际情况,加强信息基础建设,搭建文化产业信息化平台,加强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创新,加强文化产业数字化资源的运作和管理能力,打造出具有新兴产业型态的文化产业集群。(4)从“内部”出发,探究

区域文化产业创意人才存量和结构缺口,从“外部”出发,根据不同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特点,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文化产业创意人才引进政策。

本文建立了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但因研究地域特殊,在数据获取方面不够完善,也未从企业所属行业角度出发,探索不同行业的动力机制,实证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在后续研究中,将切合实际进行完善,使动力机制框架更加符合现实。

参 考 文 献

- [1] RANTISI N M. The local innovation system as a source of 'variety': openness and adaptability in New York city's garment district[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6): 587-602.
- [2] LAZZERETTI L, CAPONE F. How proximity matters in innovation networks dynamics along the cluster evolution a study of the high technology applied to cultural good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12): 5855-5865.
- [3] NG B K, MAGLI A S, WONG C Y, et al. Localised learning in the Malaysian rice cluster: proximity,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J].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017, 39(2): 163-185.
- [4] HUTTON T A. Reconstructed production landscapes in the postmodern city: applied design and creative services in the metropolitan core[J]. *Urban Geography*, 2000, 21(4): 285-317.
- [5]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6] 薛东前, 张志杰, 郭晶, 等. 西安市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机制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5): 92-97.
- [7] 戴钰. 湖南省文化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4): 114-119.
- [8] 肖博华, 李忠斌. 我国文化产业区域集聚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4(18): 94-97.
- [9] 吕可文, 苗长虹, 王静, 等.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J]. *地理研究*, 2018, 37(7): 1320-1333.
- [10] 陈光.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4): 160-166.
- [11] 朱云平.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产业集群产业链优化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12): 129-136.

- [12] 刘会学, 胡蓓, 张文辉. 产业集群核心企业异质性特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32(7): 74-77.
- [13] 梁琦, 李晓萍, 吕大国. 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一个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2): 16-25.
- [14] 陈光.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4): 160-166.
- [15] 孙小龙, 秦彬朦, 郜捷, 等. 贵州省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效率及时空演化研究[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0(4): 39-48.
- [16] 陈菁菁, 陈建军.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再定位及地区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对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的细分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 38(2): 124-134.
- [17] 方永恒, 宋婉怡, 张倩.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协同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 40(4): 24-31.

Alysis on the Driving Force for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Tibetan-Qiang-Yi Corridor

FANG Yong-heng¹, ZHAO Xue-ying¹, MA Ya-bing², SONG Wan-yi³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3.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long the Tibetan-Qiang-Yi corrido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and selection effect theory. It also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ach force factor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our force factor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sharing, knowledge spillover, industry matching and selection effect work together to varying degrees in the agglome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long the Tibet-Qiang-Yi corridor. Among them, human capital, R&D expenditure, financial industry,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human resource endowment, which are regulated by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presen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When adjusting variables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impact of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varies in magnitude. Two driving factors of development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and market size are not moderated by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Key words: Tibetan-Qiang-Yi Corridor; cultural industry;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mechanism of driving force

【编辑 王思齐】